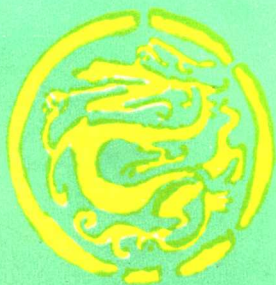


ZHONGYUAN YINYUN  
YINWEI XITONG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美〕薛凤生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美〕薛凤生 著 鲁国尧 侍建国 译

#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by

F. S. Hsueh

Ohio State University

据荷兰海牙 Mouton & Co. 出版社 1975年版译出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美]薛凤生 著 鲁国尧 等译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印张 148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619-0082-1/H·60 定价: 3.80元

## 译者弁言

多年的闭关政策使我们对海外的学术动态茫然昧然，但是这十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以音韵学界而言，回国讲学的专家联翩而至，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薛凤生教授是最积极最热心者之一。他几乎每年都回国，足迹遍海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成都、重庆、广州、徐州等地的大学多次讲学，他的《北京音系解析》一书就是在华中工学院研究与讲学期间整理出来的。他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会员，该会的第二次和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他都不远万里赶赴参加，并宣读论文。今年夏又飞来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武汉的《语言研究》杂志、北京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及香港的《纪念王力先生论文集》上都可以读到他的涉及语言学多学科的文章。（其实他对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元稹年谱》的作者。）可以说，国内语言学界对他不仅不陌生而且很熟悉，他对祖国、对学术的热爱，待人的直率与热忱赢得了普遍的推许与赞佩。如果转文，则“海内无知与不知，皆敬其人而重其文”。

1985年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江苏，在南京大学弘播学术时，我们初步了解了他对汉语音韵学的系统观点。随后我们读到了他的《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不胜佩服。在这本著作中，薛凤生先生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早期官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音位体系，逻辑地、系统地解释了《中原音韵》韵谱内各个同音字组显示的所有语音对立，制定了合理而简约的规则，阐明了从中

古汉语至“早期官话”，从“早期官话”至现代汉语的发展。他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严密的理论与方法“融于一炉”，写成了这本独树一帜、别具风格的专著。我们认为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人，它对我们如何扬弃（按，《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义，非第二义）我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合二而一，都会起到可贵的推动作用，其意义又何限于《中原音韵》研究之本身？

我们在1986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后携往美国，薛先生于1987年7月亲自校阅一过，并赠序一篇。

此书1972年写成，1975年由荷兰海牙 Mouton 出版社出版。薛先生总是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研究不断深入。十余年来发表了好几篇高水平的论文，其中尤以《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为最（《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35—56页）。该文初稿曾于1979年在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法国巴黎召开）上宣读，获得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高度评价（当时王先生尚不识其人）。王先生在《我的治学经验》一文（《高教战线》1984年8期，第14—19页）中说：“关于内外转的问题，罗常培先生写过文章，我看了不满意。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觉得也没有解决问题。两年看到美国的汉学家的文章，我认为他解决了问题。”就是指的薛凤生先生。薛先生在审校本书译稿时根据他近年的研究成果加了十六条“追注”，虽对某些“旧说”有所修正，但其研究精神与方法是“一以贯之”的，这些修正对原书的基本理论毫无影响。

此书由鲁国尧、侍建国合译，钱厚生同志曾对部分初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在著者本人阅校后，译者又进行了文字和技术加工，并按著者建议，为所引字例注出中古音。考虑到此书出版后三年，国内影印了讷庵本《中原音韵》（附陆志韦、杨耐思校勘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也是最佳的《中原音韵》版本，自较赵荫

業校訂者為勝，有些證實了著者的推論，經原著者同意，譯者據  
納庵本加了少量“譯注”。

著者和譯者感到十分榮幸的是，本書承周祖謨先生題簽。

譯者於南京大學中文系

1987.12.15

## 著 者 赠 序

鲁国尧教授愿意把我这本小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同好，这是我既高兴又感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早有这个想法，但是由于“这个那个”的原因，一直未能做到。现在由他代为完成，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象我这类“外国人”，大多心怀故国，常以不能服劳于父母之邦为憾，聊堪自慰的是，虽然寄身海外，干的却是传播与研究祖国语言文化的工作。其间偶有一愚之得，也总想奉献给国内的同好。鲁教授能把这本小书译出来，可以说是助我得偿夙愿。这类书的内容比较专门，不是仅懂英语的人就可以翻译的。鲁教授的音韵学造诣颇深，是这方面的专家，拙作能由他主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尤其令我高兴而且感到荣幸的。

这本书的初稿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写成的，正式出版距今也有十来年了。这期间我虽然没能全力以赴，却也断断续续地做了些与本书主题有关的研究。研究工作嘛，讲究的当然是日新又新，因此就难免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现在看来，书中有些个别部分就需要做一些修正了。（修正的意见散见于我近年写的几篇论文，在校阅本书的译稿时，我已用追注的方式标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但我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是始终一贯的。概括地说，我对汉语音韵的研究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其一，用最严密的推理发掘出最能代表语感的音系；其二，用最精确的方式标示出音系的演变与方言的异同。本书是拙作中最能比较全面地体现这种精神的，因此对国内的同好，也许还有一些用处，其意义绝不限

于《中原音韵》本身。对《中原音韵》的研究，尤其是材料的搜集，国内的学者已经做得甚为完美了，不是我所能企及的，但我觉得《中原音韵》只是汉语史中的一环，我们的研究必须能把它与其前后的时代上挂下联。为了这个目的，本书所用的方法也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英文本出版以后，国外曾有人批评我说，书中用的方法全是“历史的”，即中国式的老法子。近几年我多次回国讲学，自然也把我用的方法介绍给国人，又有人说，我用的方法太新了，与国内现在通行的研究方法太不一样了。其实这两种批评都对也都不对，因为我用的是“中西结合”的研究法，他们看到的只是一面。我的观点是，不论是分析现代的活语言，或是研究语言史上的某一阶段，我们的目标都是发掘出语言所特有的最能代表语感的音系。就这一目标说，传统音韵学与国外现行的音位学或生成音韵学，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当然也可以说，为了这一目标，根本无所谓中西之分。我觉得汉语史的研究也许应该走这条路子。

1987年7月再序于美国哥仑布市



## 前 言

同现代学者的绝大部分汉语语音史著作相比，拙著体现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它采用严格的音位解释，从而推论出一套按特定顺序排列的历史规律，力图阐述一段长时期的汉语语音演变史。不过这种方法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很新的，可以视作一种追随式的然而而是自觉的努力，有意识地紧紧遵循着由唐宋时期的韵图所充分显示出的中国音韵学的传统。数百年来，这种传统虽未被完全忘却，也至少未被充分理解。如今，借助于现代音位学（phonemics）和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的启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评价这种传统，并且能够看到，对于汉语研究来说，这种传统纵使并非至善至美，却也不失为一种甚为理想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再保守不过的了。

我认为，历史语言学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显得最有意义：了解某一语言历史的最佳办法是，严格使用音位理论，选择该语言的一些关键时期，然后逐步由现代追溯至古代。依我看，最靠近现代汉语的关键时期就是早期官话，它是以周德清在十四世纪初撰写的韵书《中原音韵》为代表的。由于现代汉语已经有人用音位理论进行了相当合理与精确的分析，我们现在便可以带着双重目的回溯到早期官话的研究：一是全面理解那个时期的音韵，二是为更早时期的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

本书的基本假定是：《中原音韵》把大量的汉字分成相互独立的同音字组，从而记录了当时汉语音节间一切可能存在的语音对立。运用中古汉语、韵图时期汉语和现代官话区的方言的知识，

我们应该能够建立一个早期官话的音位体系，合乎逻辑地、系统地解释《中原音韵》所记载的所有语音对立。

因为不同的方言或语言的音位结构并不相同，无法兼顾，所以本书的音位系统是严格地以《中原音韵》为基础而建立的。这就是说，《中原音韵》总是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只有当其中的某些现象不能用严格的规律合理地解释时，才偶尔采用其它资料。我们认为本书所重建的体系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不仅因为它实际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原音韵》中的所有难题，而且因为它非常整齐匀称，以致有可能制订合理而简约的规律来阐明从中古汉语至早期官话，以及从早期官话至现代汉语的发展。

在标示这类历史规律时，我们决定使用单个的“音位”及类似的范围更广的概括符号，而不用区别性特征，虽然显而易见，后者较前者有一定的优越性（参看 Halle 1962）。我们这样做主要出于两种考虑。首先，目前关于中古汉语的知识尚不足以用区别性特征来阐述。再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采用的格式能比较容易地为所有的学者接受，虽然我知道对新旧两派学者说，这可能两面都不讨好。不管怎么说，这种音位标示法的“弱点”（如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确有弱点的话），通过对“送气”、“卷舌”等特征的特殊处理，可以得到补偿（见3.2.2）。将来对上古汉语有充分了解时，如果有人愿意，用区别性特征来重写这些规则必定是相当容易的。总之，我们认为，使用音位或使用区别性特征来表示真正严格的分析，并无本质的差别。

这里应予注意的是，全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确定汉语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而不是放在从理论上阐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竭力从“理论”上说明何以某些语音发生了变化，后来却发现这些变化根本未发生或尚待证明。我的意思并非说理论解释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在确立事实之后才有可能作出理论解释，本书所关心的主要在

于尽可能地用最明确的术语来确立这些事实。

《中原音韵》编纂以后六百多年来，人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只提及在某些方面对我有所帮助的一些著作。有时我似乎对所引用的作者异乎寻常地挑剔，其实我对他们的著作评价甚高而且从中获益非浅。与之争论便足以为证。

本书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学系所作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当时豪司侯德尔博士 (Dr. Fred W. Householder) 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和委员会的其他先生们花了很多时间审阅了本书的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其他许多方面予以帮助，我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感谢赵元任博士，他非常热心地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见。当然书中一切错误概由我个人负责。

1972年2月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 术语代号表(已译者不列入)

|    |                     |
|----|---------------------|
| B  | 唇音声母 (参见3.2)        |
| C  | 充任声母的辅音 (参见7.2a)    |
| D  | 齿音声母 (参见3.2)        |
| Ds | 齿擦音声母 (参见3.2) (译注1) |
| E  | 韵尾 (参见3.1)          |
| F  | 韵母 (参见3.5.1)        |
| Fr | 擦音 (参见3.2)          |
| G  | 喉音声母 (参见3.2)        |
| I  | 声母 (参见3.1)          |
| L  | 流音 (参见3.2)          |
| M  | 介音 (参见3.1)          |
| N  | 鼻音 (参见3.2)          |
| P  | 颚塞音声母 (参见3.2)       |
| Pj | 颚擦音声母 (参见3.2)       |
| Pr | 卷舌音声母 (参见3.2)       |
| R  | 响音 (参见3.2)          |
| S  | 塞音 (含塞擦音) (参见3.2)   |
| T  | 声调 (参见3.1)          |
| V  | 韵腹 (参见3.1)          |
| Vn | 内转韵的主元音 (参见3.6.2)   |
| Vw | 外转韵的主元音 (参见7.2d)    |
| V1 | 外转一等的主元音 (参见3.6.2)  |
| V2 | 外转二等的主元音            |
| V3 | 外转三等的主元音            |

V4 外转四等的主元音

X,Y,Z 语音规则的变项

**译注:**

(译注1) sibilant, 译作“**嘶音**”，包括擦音和塞擦音。

# 目 录

|                        |         |
|------------------------|---------|
| 译者弁言.....              | ( 1 )   |
| 著者赠序.....              | ( 1 )   |
| 前言.....                | ( 1 )   |
| 术语代号表.....             | ( 1 )   |
| 第一章 绪论.....            | ( 1 )   |
| 第二章 《中原音韵》评介.....      | ( 6 )   |
| 第三章 《中原音韵》的音韵背景.....   | ( 17 )  |
| 第四章 《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   | ( 31 )  |
| 第五章 《中原音韵》的元音系统.....   | ( 50 )  |
| 第六章 《中原音韵》的所谓入声问题..... | ( 113 ) |
| 第七章 结论.....            | ( 152 ) |
| 书目选录.....              | ( 170 ) |
| 书目增补.....              | ( 175 ) |

## 第一章 绪论

汉语的历史一般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早期主要以《诗经》（公元前六世纪）为代表，称作“上古汉语”；第二时期以韵书《切韵》（公元601年）为代表，谓之“中古汉语”；第三时期从《中原音韵》（公元1324年）迄今，普通称之为“官话”，也可以叫作“新汉语”。当然，这三个主要时期都能作进一步的划分，例如，官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早期官话；以某本明代韵书（毕拱辰的《韵略汇通》似可入选）为代表的中期官话；现代官话（或现代北京话）。笔者拟对早期官话的音韵作出新的解释，以便尽可能系统地阐明从中古汉语至早期官话以及从早期官话至现代北京话的发展。在开始探讨早期官话的音韵以前，需对汉语音韵研究的背景作一些介绍，以便用正确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本章的要旨。而且，我们将以最简略的语言勾画出所要做的工作的大致轮廓。

1.1 中国的音韵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第一次重大突破是以两字给一字注音方法的发明，这个早在公元二世纪就产生的方法，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反切”。它可能是梵语语音学东传的结果，这点尚欠直接的证据。在此以前，人们一直使用直音法与声训法。前者是以同音字或音近字注明某字的读音，后者要求注音的字也必须也显示或暗示被注音的字的意义<sup>①</sup>。

1.2 反切方法是先把一个字所代表的单音节分成声母和韵

母，然后取一声母（不论是辅音或是零声母）与之相同的字作为反切上字，再取一韵母（即声母之后的所有部分）与之相同的字作为反切下字。公元七世纪前，已有很多韵书采用这种新的注音法，陆法言撰写的具有总结性质的《切韵》最为著名，但此书久佚，我们所见的是其两种增订本（基本上保持原貌，只作若干变动）：一是唐代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一是宋代陈彭年等的《（大宋重修）广韵》，后者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知，这些韵书都是把汉字先按四声分类，每声之下再分若干韵，《广韵》有206韵，《王韵》有195韵，《切韵》只有193韵<sup>②</sup>。

1.3 汉语音韵研究的往下一个阶段有两件大事。首先是确定三十六字母，每个声母皆有专字代表，其次是创制出韵图，其中除了开口和合口的对立外，尚有四等之分。韵图经过精心的设计，当时汉语里每一个可能的音节，都在某图的某声调、某字母以及某等之下有其恰当的地位。这些韵图尚存数种：《韵镜》与《七音略》刊印于宋代，但似乎起源于唐代，与其所欲表现的《切韵》系统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尚有宋代《四声等子》与《切韵指掌图》及元代刘鉴所撰《（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后三者将具有相似的开口或合口韵图并成韵摄，与《切韵》差异较大<sup>③</sup>。虽然《切韵指南》编写于元代，甚至略后于《中原音韵》，但可肯定它脱胎于较早时期同一性质的韵书，很可能代表了十世纪左右的标准语<sup>④</sup>。下文提及韵图时，除非另作说明，总是指这本书，尤其是李荣所校定过的形式<sup>⑤</sup>。

1.4 关于《切韵》代表的中古音，人们已做过大量研究。较重要的著作有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的“中古汉语的区别”、董同和的《中国语音史》、李荣的《切韵音系》等等<sup>⑥</sup>。马丁作了值得称道的努力，在其《中古汉语的音位》里拟定了那个时期的音位体系。以上这些学者专力研究中古汉语音韵时，都曾利用宋代韵图作为拟音的框架，虽然他们也直率地承认这些韵图



经常显示出它们自身时代的语音特点。奇怪的是，就我所知，尚未有人作出专门的努力以阐明任何一本韵图所包含的语音系统，即《切韵》成书四百年后的时代的语音系统<sup>⑦</sup>。关于中古汉语语音，确是做了许多卓绝的工作，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止摄中有些韵仍未能区别开来，双唇音声母唇齿化的具体条件，以及内转与外转相互对立的真正意义等<sup>⑧</sup>。而且我并不完全满意马丁音位化体系中的元音系统，它显得不够整齐匀称。所有这些都说明，只有继续研究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古汉语的语音，但是所有能做的差不多已经运用今天的研究方法做过了，即集中于对《切韵》的研究。然而就不可能有一个新的途径吗？

1.5 如果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书面文献，重建中古音的方法或许是从大量的现代方言（或语言）着手。我们不妨努力为每一个现代方言群重建一个原始语，例如从各种现代粤方言重建古粤语。然后，根据已经重建的许多语言构拟一个更早时期的语言，依法上溯。但是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书面文献资料——韵书和韵图。这些书籍明确地显示了它们那个时代的语言的全部必要的区别。我们确信，构成每一种韵图或韵书的实际基础是该书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语言的音位结构。我们可以说，在对某本书的共时研究中，首先大略地勾画出它的音位结构，比起推断每个字的音值相对地容易些。我们关于音系中的音位及其音值所能做的是就其前一时期的来源及其后的发展作出合理的推测。当然，不顾及现代的音位系统，就不可能建立起某一历史时期的音位系统，理由很简单，我们必须从确切已知者入手。显然，我们要研究的时代越接近我们，就越有把握搞清楚它的音位系统。我们感到，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另一途径是选择一些关键时期，然后由今而古逐步推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较后时期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利用所能拥有的对较早时期的知识，事实上，我们正必须这样做。它只是指，对一个确定的时期的了解越